

(194-200 Hillary Clinton was well known...world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22 Paragraphs)

希拉莉·克林顿早在他丈夫成为美国总统前已经十分出名了。当她丈夫还在阿肯色担任州长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关于她如何能干的一些故事，还有她想保有自己的父姓的坚持。她也常会到华盛顿来做一些有关民主政治的演讲。她曾经服务于“保护儿童基金”，并一度担任主席，我也是由于热衷于这个机构而得以与她相识的。我向她自我介绍说我也是威而斯利学院的校友，并告诉她她的几个演讲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也热情的与我互相交流，由此种下了我与她之间友谊的种子。

在 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我见过她几次。后来又在就职典礼后于大卫营进行的政营修整活动中再见到她，这是个奇怪的活动，很多人都聚集在很小的营帐里。在如此闭塞的气氛中，第一夫人就如同纯净的氧气一般。她是如此的能言善辩并积极参予各种问题的讨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更深的感受到她消息灵通的程度和她对外交政策浓厚的兴趣。

美国人被希拉莉·克林顿迷住了。这当中也有两方面的见解。大部分人欣赏她的热情，包容和智慧；也有些人不能接受她讲话不留情面的风格。那些不喜欢她的人都觉得她有些冷酷，喜欢她的人又会相信她做出过的承诺。就如同另一位著名的第一夫人，爱琳诺·罗斯福一样，对她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的。在总统第一任期间，她曾开玩笑说与过世不久的先辈有过对话，人们对她正反两方面的评论更明显了。

我和这位第一夫人的关系逐渐深厚起来。因为她常常有机会来纽约访问，我也会和她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联合国的有关事宜，我邀请她与一些外国代表团正式见面，她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年的圣诞节，我把我在纽约的公寓借给她，她母亲和切尔喜。还有一次她来我家过夜，我们穿着睡衣秉烛夜谈。当总统在白宫设宴款待外国领导人时，来访的首脑也被安排在第一夫人身边，喜拉利总是把我安排在贵宾席的另外一侧，她认为我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有助于开展各种类型的讨论。我们之间的合作在 1995 年的夏秋期间变得更加亲密起来，那时我们正在为即将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会议做准备工作。

妇女权力状况是我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的。我刚到纽约时就意图与其他的妇女代表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网。那时的联合国有超过 180 个成员国，所以我便假设，如果组织一个午餐会将至少有几十位妇女代表参加，但我的估计错了。当天在我公寓进行午餐会时，只有六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加拿大，牙麦加，卡萨克斯坦，列支敦斯登，菲律宾，千里达托贝哥。

做为一个美国人，我提议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建议可在我们之间建立一个电话网。这个合作协议让很多男性代表不安，他们认为列支敦斯登的女性大使能够比他们更容易接触到美国大使是不符合逻辑的，我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很容易，只要他们把职位让给女性就可以了。我们的团体被命名为 G7，每月开一次会。我们互相分享经验，甚至讨论一下为什么联合国是纽约唯一的一个上女洗手间不用排队的地方。当然我们也会有些重要的计划，国际战争裁判席创建时，我们就致力于推选女性法官，这是因为在受害者之中有不少女性。我们成功的推选了两位女性法官包括有声名卓著的法学家，盖勃·柯克·麦克当娜，她后来成为了首席法官。我们向秘书长表示希望更多的女性能谋得联合国中的高职位。同时我们也开始为参加北京会议的成员国做准备。对美国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国会中执政党的反对者而言，筹备妇女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毕竟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女性权益的会议，第一夫人也有可能参加。会议期间将会有许多自由讨论。保守派认为美国的与会将会为中国不平等的人权政策背书。政治专栏的作家建议美国代表团重新定义母性，父性，家庭和性别。脱口秀的主持人甚至还说第一夫人就是想在多个领域把男性和女性分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有人认为我企图得到五个性别在法律上的认同，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只能回答在我的定义里只有男女两性。

中国早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前就被选为此次会议的主办国。北京的领导人因为太过注重于借此会议提高国家声望，反而忽视了因此而带来的麻烦。一直到开始着手准备这次会议他们才意识到自由参与和讨论才是这次会议的关键。由于多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NGOS)将会出席这次会议，这些代表加上正式代表对会议的进程和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无可避免的是与会人士将通过多种努力，诸如游行示威，抗议，张贴海报等来受到公众的瞩目。各类的独立小报也会大量出版。

根据联合国会议的传统，在北京非政府组织的论坛将会与正式的会议同时进行。预计出席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将会超过4000人。然而在会议举行的几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声称为非政府组织论坛设定的会场“结构上来讲不安全”，他们同时宣称这个论坛将会改在距离北京一小时车程的怀柔进行。非政府组织人士为此非常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所谓“结构上不安全”的体育馆仍在继续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另一方面是因为怀柔缺乏足够的设施。在几个月来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他们绝不会放宽底线。非政府组织会有意识的采取他们的行动，中国政府当然也会防止尴尬事件的发生，为了防止女性在马路上裸体示威，他们还给出租车司机发放了遮盖物，以便在需要时用。

国会两党成员都坚持抵制这次会议。我赞成出席，因为我觉得不完全遵照主办国的一切政治条款而去参加会议也是有可能的。这次会议主要可以提高国际妇女地位，中国也只可以从超过4000个代表成员出席会议这方面获益。我的反共人士的身份比以纯粹妇女身份对国会来讲更有说服力。

多项争议后，第一夫人进退两难，她很想去北京，但白宫顾问质疑她是否应该去承担这个政治风险。焦点集中在她身上，如果她做错事或说错什么的话，总统的政治对手将会有机可乘。持续几个星期那些权威人士成天都在猜测她会不会出席这次会议。自从一位中国民运人士吴弘达在中国被捕，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直至最后吴弘达被释放，第一夫人才作出了出席的决定。

同时我也有自己的矛盾，我的女儿凯蒂正要和她在法律学院念书的同班同学杰克·夏上结婚，婚礼被安排在妇女会议召开的前两天，但两地相隔半个地球，我必须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首先要妥善安排飞行计划和时差，婚礼舞会一结束，在午夜我赶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就搭乘清晨的飞机飞往夏威夷，我错过了第二天的各项婚礼活动，但却赶上了和第一夫人一起从夏威夷去北京的飞机。在飞机上喜拉利和我讨论了一下演讲的内容并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下。

我们大概清晨四点到达北京，当地正下着倾盆大雨，其实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是这种天气。因此，每天都会有一群中国少女站在旅店门口为我们递上塑料袋防止雨伞滴水。在北京最美的景色之一要算是满街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黄色，紫色，海兰色，红色的，给灰暗的天空和街道带来一道彩虹，就似一幅水彩画。这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我买了一打各色雨衣，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家人。当然穿在维吉尼亚的马路上与在这里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但只需不到一美元就可以让我们在雨天保持干爽，也是很值得的。

我们住在中国国际酒店。酒店的大堂已变成了一个旋转的舞台，来自各国的妇女们穿着各种各样的礼服，带着七彩围巾，当然还有更多的人穿着普通正规的服饰。女性们繁忙的走来走去。中国男人则在角落里对着他们放在衬衫袖口里的话筒轻声说话。晚上一个来自泰国的三人演奏组表演了一些传统经典曲目，如“月亮河”，“纽约，纽约”。

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喜拉利就作了演讲。以我做公开演讲的经验看，在这次会议上要激发公众的热情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有那么多成功的演说家在场。我不认为我在北京可以激起人们的激情，听众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翻译就可以使第一夫人的演讲变的平淡无奇。

然而，喜拉利的演讲是绝妙的，她不但措辞精准而且表达出色，她表示强烈支持家庭价值，责备了中国政府不允许言论自由，并点出了这次会议的中心“人权即是女权，女权也就是人权”。在第一夫人演讲时，整了会场寂静无声，她结束演讲时掌声四起。当天晚些时候，我注意到华盛顿时报的资深记者乔治·阿齐鲍得，他把第一夫人的演讲形容为家门外的胜利。当然，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道这次演讲的内容。

第二天，我也作了我的演讲，我承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提升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生活品质。虽然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但无论是第一夫人或我的演讲都可用在世界任何地方召开的妇女会议。我们要表达的信息是简单和通用的，对女性的暴力必须停止，男女必须平等。女性应该享有社会的各种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和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力。

在整个星期中访问团和与会者都觉得中国采取的保安措施大致上是让人有压迫感的，但有时又是好笑的。例如，有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房间电视机有问题，她就不断的调整图像，等图像清楚了，却看到了自己在调整电视机的录影；还有个代表想要用电熨斗熨自己的裙子，这违反了旅馆的规定，她刚开始熨就有人冲进来拿走了她的裙子，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把她的衣服送回来，已熨好并折叠好了；在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来自各个国家的团队都进行了示威活动，看着一队队

的示威人群高举着他们的牌子走过，一个疑惑的中国官员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问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LESBIA 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举的牌子是 LESBIAN-女同性恋。

会议期间我接到过一个由妇女基金会的马莉·威尔逊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召集了数百名残疾妇女来参加此次非政府组织论坛，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会议的组织者竟然把残疾人的集会安排在一个没有电梯的楼房的三楼，他们还把残疾人的住所安排得远离公路，由于轮椅在泥地上不能转动，所以一些代表必须由专人送往开会地点，为她们的这次行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马莉的要求下，我同意在非政府组织残疾女性的集会上作演讲。当我们到达时，我立即就能体会到这些代表能到这儿来开会有多么的困难，她们一定是越过重重障碍才能到达这里。我指责了主办方对残疾人士安排上的失误，并表示，除了最近的收获，其实世界上女性的地位还是被低估的，女性的权益没有被充分重视，这并不是说女性找不到工作，在很多地方她们负担大部分的工作，但她们没有资格拥有土地，不能受教育，也得不到赞誉和尊敬，甚至还不能得到报酬。这些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只有当女性有权去左右经济和社会时，贫穷的锁链才会被打破，家庭关系才会更牢固，性病传播也会减缓，年轻一代才会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拜访完这些残疾女性后，我们回北京时顺道参观了长城。人人都会记得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这里的第一反应“这是伟大的长城”。在卡特任总统期间我也到这里来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入口处有数以千计的小贩在那里贩卖 T 恤、毛巾和小玩具。每个摊位都可以讨价还价，但所有人对每样货物都有同样的底价，这是个看似自由竞争的市场，实际上却缺乏自由。

第一夫人的演讲成为了此次会议的焦点，但在焦点外也有会议也收到很多成效，比如设立了行动平台，用来督促提高各大州妇女的生活品质，自那年以后，我经常碰到来自各地的女性，或是自己或是有朋友曾参加过北京的会议，还有人说受到北京会议的启发而展开了各种行动，在北京，她们的国家政府正向全世界承诺会尊重女性的权力。